

# 宋代音乐文物赏析

## ——以东昌府区出土宋铜钮钟为引

刘莉

山东古称海、岱，又称齐鲁之邦，在这片土地上有孔子创立的儒家音乐思想学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音乐文化体系，遗留了非常丰富的音乐文物，笔者拟通过挖掘东昌府区博物馆馆藏4件宋铜钮钟背后隐藏的文化信息，进一步阐释齐鲁音乐文化的动人风采。

东昌府区博物馆馆藏4件宋铜钮钟(图1)，宋代，铜质，除一件铎部有小块旧缺外，保存基本完整，弧舞，舞部置环形钮，最大的3件舞部中央有一小圆孔，器身横断面作椭圆形，于口作月牙形内凹，铎部微弧，表面锈蚀，钟身应有纹饰及分区，现已模糊，难以辨认。钟内腔有不明螺旋纹，较为平整，未有音梁及调音痕迹。通高分别是37厘米、36厘米、35.5厘米、19.5厘米，舞修分别是13厘米、13厘米、12.5厘米、6.5厘米，铎间分别是14厘米、14厘米、13.5厘米、8厘米。笔者梳理了国内相关器物，现拟从形制、纹饰、用途等方面对其进行探究。

经过梳理发现，同东昌府区博物馆铜钟形制相似的音乐文物在全国也比较少见，简单整理如下。四川博物院藏剑阁窖藏出土的南宋铜钟(图2左)，桥型两端起渐扩，至铎角处略收，铎角锋锐，于口上弧，铎部阳线框分隔铭文“大吉羊”，鼓部有纹饰，通高18厘米，口径12-5.8厘米。河北博物院藏2件汉铜钟及1件宋金“响声流转”钟(图3)，2件汉铜钟数据不详，“响声流转”钟系青铜合范一次铸成，舞部留有清晰铸迹，通体呈墨绿色，有光泽，弧形舞面，上置有半圆环形钮，合瓦形腔体，两铎弧向外突，铎角内凹、下垂，于口弧曲上收，有内唇，腔面以宽阳线界隔，铎中有铭文，一面为“响声流转”，另一面为“遍满十方”，两面其余纹饰一致，铭文两侧有童子戏班等纹饰，鼓部双狮纹，无音梁及调音痕迹，通高36.5厘米，舞修13.7厘米，铎间19.4厘米。1979年陕西省汉阴县蒲溪乡出土了4件青铜编钟(图4)，分大小两种，均为合瓦形，拱形环钮，月牙形口，大者通高32厘米，舞修15.5厘米，铎间19厘米，小者通高20厘米，舞修8厘米，铎间12厘米。大钟铎部正反面均用梯形格栏分为四格，分别楷书“响声流转”“遍满十方”，铎部两侧上下部满菊花纹，中部蹲坐戏耍的童子，鼓部为奔腾跳跃、张口翘尾争斗的双犬或双狮；小钟形状、纹饰同大钟基本相同，铎部两侧为流云纹，鼓部素面，铎部一面楷书铭文“狮子吼声”，另一面楷书“大”字。专家根据同时出土的宋砖、“政和通宝”、瓦片及钟的纹饰图案，推断4件编钟为北宋晚期遗物。宝鸡市建筑工地上出土的5件铜编钟，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其中一件编钟铎部楷书“遍满十方”四字，通高31至36厘米。《梦都草堂吉金图》中记录有一件形制相似器物，未有具体说明，其铎部铭文应是“响声流转”四字，纹饰同河北博物院“响声流转”钟基本一致。

另外，经过梳理发现一些铜铃的形制及分区和本铜钟多有类似之处。上海博物馆藏南北朝檐铃(图2右)，锈蚀，通高25.1厘米，舞修8.4厘米，铎间11.4厘米，铎长21.5厘米。衡阳市博物馆藏战国环钮铜铃，保存基本完整，舌已不存，铜质，表面褐色，腔面纹饰漫漶，通高24.5厘米，舞修7.5厘米，铎间12.6厘米，铎长21厘米，正鼓厚0.6厘米，侧鼓厚0.4厘米。华亭市博物馆藏明“大吉利”铜塔铃(图2中)，塔铃顶部圆形，口两旁，正面上部减地阳文三楷书“大吉利”，下部饰云纹，背面饰花纹，通高18厘米，口径7厘米。还有青岛市博物馆藏大吉利铃，伊宁县阿热斯坦乡沃依曼巴托海村征集的“大吉利大合罗”扁铜铃，内蒙古博物院藏汉“大吉”铜铃，秦安县博物馆藏汉代“宜牛羊”铜铃，凤翔县博物馆藏汉长乐富贵铃等。这部分铜铃都有阳纹棱边，通高基本在15厘米以内，且大多为合瓦形腔体，半圆环钮，于口微弧曲上收，舞和铎长度相差不大，舞部中心有一圆孔通腹腔以悬吊铃舌，多半铃舌已失，整体较为瘦长。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一号窖藏出土的铜钟，完整器，环形钮，折肩，斜直臂，钟口内凹，通高23.4厘米，口径11厘米，扁宽8.5厘米，钟身为合范，两面各有一略下凹的长方形框，一面铭文“凤翔楼钱鑫”，另一面字迹已磨灭，不易辨认。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辽代风铃，临沂市博物馆藏清空里慈声铜钟等，通高在15至39厘米之间。其形制除于口构造不同，铜铃腔体近菱形外，整体形制同本铜钟相类，且有专家认为，铜钟、钮钟等很有可能是受中原商文化中铜铃的影响，所以本文把此类铜钟、铜铃一并做了整理。

周公制定了礼乐制度，伴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礼乐制度逐渐开始瓦解，到了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已经被破坏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两汉时期，周王朝制定的礼乐制度彻底瓦解，先秦编钟的壮丽奢侈与繁华也荡然无存，青铜编钟的制作，如一种双音，音梁构造、调音磋磨等技



图1 来源：东昌府区博物馆



图2 来源：从右到左：“博观记”微信公众号、“华亭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图3 来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



图4 来源：《文博》1992年01期



图4 来源：《文博》1992年01期



图5 来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术也遗失殆尽。汉代以后，政权更迭，历朝历代当政者追求周礼，试图恢复礼乐制度，同时铸造了大量的编钟。到了宋代，特别是宋徽宗朝以后，复古之风更甚，徽宗时期专门设置了掌管音乐的机构“大晟府”，铸造了有名的“大晟编钟”(图5中)，同时制作仿古青铜器赏赐文武百官作为家庙礼器。这种复古风潮也蔓延到了民间，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民间开始大肆私铸青铜器。所以，宋朝以降，仿古青铜礼器大规模出现，这点从宋代以后铜钟的铭文和形制方面都有所体现。

首先是铭文在仿制前朝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革新，使之具有了当时的特色和新意，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不同时代人们的设计意识和“崇古追新”的审美情怀。如“大吉羊”“大吉利”“大合罗”等沿袭了汉代的吉语文化，也是当时人们生活幸福，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表达方式。铭文“凤翔楼钱鑫”的铜钟进一步折射出当时物阜民丰，不管是庙堂还是民间，人们在精神层面有了更高的需求和寄托。“响声流转”“遍满十方”“空里慈声”等词语在佛教、道教的理念与内涵中都有所体现，道教斋醮仪式包含很多赞颂词章和祭祀音乐，用乐时也会使用打击乐器。如，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觉缘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灭——佛教《楞严经》。尔时，救苦天尊，遍满十方界，常以威神力，救拔诸众生——道教《太上救苦经》。在佛教与道教中，十方都指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上方、下方，用来象征整个宇宙。万有现象的生灭相续，循环不止，称为“流转”，在佛教中又有轮回之意。“狮子吼”，在《维摩诘所说经》中有云“演法无畏，犹狮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在佛教中，佛陀常被称为“人中狮子”。《大智度论》记载：“又如狮子，四足兽中独步无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于九十六种道中一切降伏无畏故，名人狮子。”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七中记载了菩萨十种狮子吼。《契经》中说：“供‘铃铎’于塔庙，世世得好音声。”在一些塔庙的相轮和檐端，也悬有铃铎，如前文中上海博物馆檐铃及华亭市博物馆藏铜塔铃等。同时，在定州博物馆藏北宋莲花银鎏金佛像舍利塔上可以看到塔檐上所悬挂的檐铃，类钟形。

形制方面，仿古青铜礼器钟基本为兽钮阔腔平口有纹式，直至清代仍在延续。关于这点，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现在留存的府学、县学、文庙等编钟，在陪葬的明器中亦有体现。如沂水县博物馆藏宋代沂水龙钮圆钟，四川博物院藏宋代兽头钮钟，常熟博物馆藏元代完颜璋编钟3件，上海博物馆藏元大德九年杭州儒学中吕钟(图5左)，元至治三年嘉定儒学钟，湖南博物院藏元至元五年至元己卯钟，上杭县博物馆藏明上杭孔庙编钟6件，莆田市博物馆藏明隆庆六年兴化府文庙编钟5件，莆田文庙编钟6件，饕餮纹钟，涪陵市文物管理所藏明涪陵文庙编钟9件，三台县文物管理所藏明三台文庙编钟10件，还有泉州市博物馆藏清雍正四年、雍正六年、雍正八年、道光十年的晋江文庙编钟，泉州府学文庙编钟，荆州博物馆藏清江陵文庙编钟12件，绵竹文庙编钟10件，常熟博物馆藏清光绪元年常熟县学编钟16件等等，其中常熟县学编钟、江陵文庙编钟等经专家测试仅用作县学、文庙礼钟，非为实用乐器。现存留存的宋代以来的府学、县学、文庙等所用编钟数量丰富，形制多是直筒型、圆球形等，横截面基本都是圆形，大小相等，铭文包含律名、捐造人、监造人、建造人、用途、造制时间等，同东昌府区博物馆所藏铜钟形制、纹饰等皆有所不同。

值得提出的是山东遗留下的青岛市博物馆藏宋代钮钟明器2件，山东博物馆藏清乾隆东昌编钟2件(图5右)，2件宋代钮钟明器同大晟钟形制相似，是宋徽宗诏命新乐在山东地区的体现。2件东昌编钟两面分别楷书铭文“圣庙乐器”“乾隆辛酉年东昌府同知潘琬监制”，也是聊城礼乐文化的实物见证。东昌府区博物馆馆藏的4件铜钟发现位置在聊城古城区原通用机械厂西邻，明清时期其附近有东昌府同知衙门、朱氏老府故址等，至于宋代时其上为何建筑因史料缺乏，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依据其形制、同类器物铭文及发现地点推测4件铜钟的用途应同佛教有非常大的关联。

历史的长河流淌不息，聊城东昌府区古城自宋代以来，经历了宋金、金元、红巾军、靖难之役等多场战役，虽然历经兵毁与重建，但是作为礼乐器的4件铜钟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得以保留，成为齐鲁音乐文化及区域软实力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润物无声的表达，它会在潜意识里影响我们以礼立身，以乐治心，不断谱写精神文明建设新篇章。【本文系2024年度山东省聊城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聊城古城区文化旅游发展路径研究”(ZKTK2024183)阶段性研究成果】

也谈义马上石河墓地的族属问题

李清丽

2017年7月至2018年9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义马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位于义马市区南部、石河西岸的上石河墓地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通过对发掘清理的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进行研究，发掘者认为义马上石河墓地“是一处保存完整、排列有序、规划严谨的春秋早期墓群，是继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之后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虢国邦族墓地。”但关于墓地的族属，他们认为“是虢国东逃的贵族、家眷以及护卫随从的墓地”(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义马上石河春秋墓》，科学出版社，2024年1月)。笔者认为此结论有待商榷。

### 从考古学特征看，上石河墓地确是一处虢人族墓

上石河墓地位于河南省义马市区南部原上石河村中，北临310国道，南接新安古城遗址，西边是开祥化工有限公司。2017年，义马市文物勘探队对此地进行考古钻探发现了该墓地。目前已初步探明该墓地现存范围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50米，总面积3万余平方米。之后，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义马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此次考古发掘共清理春秋时期墓葬107座、马坑9座，出土各类遗物3549件。墓葬有大小之分，面积15平方米以上的只有两座，多数为中小型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壁上下垂直，墓底四周设熟土二层台。葬具为重棺单槨，单棺单槨或单棺、单槨，重棺单槨的14座。大多数墓葬为南北向，墓主多仰身直肢，头北足南，身份稍高的棺内铺有朱砂。这与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埋葬习俗基本相同。

随葬器物以青铜礼器为主，出土有铜鼎、铜簋、铜盃、铜方壶、铜盂、铜匜、铜壶等礼器，还有铜戈、铜矛、铜盾、铜铍等兵器，铜辖、铜衔、铜镳、铜带扣、铜铃等车马器，以及玉璧、玉璜、玉珪、玉串饰等玉石器，器物种类与器物形制均与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器物相似。

部分出土器物上装饰有纹饰，有青铜礼器上的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瓦垄纹等，玉器上的尖尾龙纹、缠尾双龙纹、凤鸟纹等，也与虢国墓地出土器物上的纹样基本相同。

更为重要的是，上石河墓地M93出土了一件带铭文的铜鼎，其上铭文表明该墓地与虢国有关。M93是上石河墓地中等级最高的墓葬，面积达17平方米，葬具为重棺单槨，外棺的四角各放置一件铜盂。随葬有青铜、玉、骨等器物1334件(组)，其中青铜礼器13件，含鼎4、簋4、方壶2、盃1、盘1，其中一件铜鼎内铸刻有“虢季氏子虎父作鼎子子孙孙永宝用”16字铭文，意即虢季氏之子虎父作铜鼎，希望子子孙孙永享享用。“虢”为国名，“虎父”为器主，应是虢国“虢季氏”的儿子。发掘者根据墓葬形制、铜礼器组合以及铜盂数量，断定该墓主身份应为大夫级贵族。这一推论也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

此外，上石河墓地因一条Y字形河道而分为三个区：南区墓葬规模比较大，分布稀疏，墓葬多为南北向，是较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区；北区墓葬相对较小、分布比较密集，墓葬也多为南北向；东北区多为小型墓葬，墓向以东北向为主。同时期墓葬不存在打破或叠压关系，表明该墓地具有一定的规划性，且有较为严格的埋葬制度。

综上，无论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还是从随葬器物的造型、纹饰、铭文等考古学特征来看，上石河墓地都应是一处虢人的族葬墓地。

### 上石河墓地是虢国卿大夫的氏族墓地

关于虢季氏虎父一族缘何埋葬在义马上石河，发掘者认为，公元前655年虢国被晋国灭亡后，虢公丑带领部分贵族东逃京师，周王(赧)以义马这块京畿之地与虢国的交



虢季氏虎父铜鼎及铭文



接地分给虢人作避难栖息地，故上石河墓地很可能是虢国东逃贵族等人死后的墓地所在。笔者认为，该墓地可能是一处虢国卿大夫的氏族墓地。理由有二：

一是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推断。虢国被晋国灭亡后，虢国国君虢公丑带领部分家眷、亲信等向东逃亡，到周王室寻求庇护。《左传》僖公五年曰：“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齐师。”《史记·晋世家》亦云：“(晋献公二十二年)其冬，晋灭虢，虢公丑奔周。”说明灭虢后的部分虢人跟随国君虢公丑投奔了周王室，但周王如何安置他们史书上没有明说。

三国魏时期，魏文帝曹丕组织儒生范范、王象等撰写的类书《皇览》中记载：“虢公家在河内温县郭东，济水南大家是也。”“温城南有虢公台，基址尚存。”说明在今河南温县一带有虢公家、虢公台。宋人裴骃在《史记·晋世家》集解中引《皇览》说：“虢公家在河内温县郭东，济水南大家是也，其城南有虢公台。”也就是说，公元前655年虢国被灭后，虢公丑带领一部分贵族出奔东周王城洛陽，周王看在虢国这么多年来勤王有功的份上，在苏国(今焦作温县)给了虢公丑一块土地，让其在那里颐养天年。由于苏国与虢国是政治婚姻关系，苏国国君收留了虢国国君，虢公丑最后也在苏国终老，埋在了当地。

这样的推断也能从现有的遗迹上得到印证。目前，焦作孟州西魏镇确有虢公家、虢公台等遗迹，温县城西北的黄庄乡有东魏村和西魏村。这就说明了东逃的虢国贵族并没有被安置在义马这块京畿与虢国的交接地带，所以也就不会埋在那里。

二是结合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分析。众所周知，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周王把全国的土地分封给同姓宗族、异姓功臣和上古帝王的后裔，得到封地的人称为“诸侯”，对周王要尽到服从命令、镇守疆土、交纳贡赋、随从作战、朝觐述职等义务，各诸侯的封地称之为“国”。诸侯在自己的国内，又对卿大夫实行再分封，卿大夫要辅助国君进行统治，并对国君有纳贡赋与服役的义务，卿大夫的封地称之为“家”。卿大夫再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这样层层分封下去，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森严的等级制度。如春秋初期，晋昭侯分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后来曲沃发展壮大代替大宗成为诸侯。最为著名的就是晋国的六卿，随着卿大夫实力不断增强，最后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

由此看来，虢国东迁到陕地以后，也在自己的疆域范围内对卿大夫进行了分封。义马地处崤函古道，在春秋时期处于虢国与周王室王畿范围之内，属虢国范围之内。虢国国君将虢季氏子虎父一族分封在那里，让他们在那里生产生活，护卫边界，上石河墓地内的一百多座墓葬排列有序，保存完好，布局清晰，相互之间没有打破关系，说明该墓地有着严格的埋葬制度，是有着“墓大夫”专人负责管理的邦墓。这进一步说明了此处墓地是经过规划的墓地，不是虢国被灭后周王临时安置的虢人的最后埋葬地。

综上所述，上石河墓地是继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之后又一处较大规模的虢人埋葬地。参照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宗法制等制度，结合墓地的考古学特征，笔者认为上石河墓地可能是虢国分封到义马一带的卿大夫的氏族墓地。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不仅填补崤函古道上春秋时期中小型贵族墓地的空白，也为研究周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丧葬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 一枚县委大印背后的红色故事

朱小兵

江苏省如皋市档案馆收藏的一级文物“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据查证，是迄今为止在国家文物局备案印章登记中国共产党组织史上县一级党组织最早的印章，弥足珍贵，极具革命历史文物价值。该印于2022年入选江苏省第二批可移动革命文物。

此枚印章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上圆下方匀称得体，刀工遒劲，制成于1927年，印上部直径3.7厘米，高0.15厘米，印下部边长3.9厘米，高1.9厘米，质地为水藻花青田石，色泽包浆莹莹，略显淡黄白色，微透起冻，材质上佳，古朴敦厚。印面镌刻白文篆书“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十二个火红的阳文小篆字，单刀浅刻道劲，镌刻流畅，章法规整，笔画细劲犀利，匀称得体的宽边款。

第二，出土时间地点详细，来源清晰。1965年秋，在原如皋县民政科招待所翻建房屋时被偶然发现，施工人员在清理下水道时发现了一处砖砌圆拱，拱内放有一平边铁锅，其釜冠上放有一双绣花布鞋，铁锅内有一副脚镣、一把剃刀和百余发子弹、剃刀和子弹下方埋藏着这枚印章。在土地革命时期，招待所原为国民党的看守所，曾经关押过我党的许多革命志士。

第三，历史文献记载清楚，时代明确。如皋市委党史办原主任李实秋在1929年1月16日的上海《申报》中发现了这枚印章的线索。1929年1月17日南通《通商日报》也有记载。该枚印章是时任中共如皋县委书记徐芳德被捕时从其护兵杨成置身上搜出来的，当时还搜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江北总指挥印”。徐芳德，1901年出生于如皋江安镇六角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月，徐芳德等人潜回江安整编游击队时，在卢港被国民党县警察中队包围，腿部中弹被俘，遭刑讯逼供、叛徒劝降未果。同月27



日，英勇就义，年仅28岁。从这枚印章的出现，再到被国民党缴获，最后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以看出当时如皋革命斗争的残酷性。

这枚印章历经近百年的岁月淘洗，仍完好地保存至今，它的背后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27年7月，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中共如皋县委正式成立，成为江苏最早成立的县级地方党组织之一。至1933年，这短短6年，中共如皋县委8位书记中，有7位光荣牺牲，平均年龄仅25岁。这枚印章，见证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早期地方基层组织成长和发展的风云历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员忠于信仰、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见证了革命者前仆后继、坚如磐石的意志，它似一把火炬，一直照耀着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遗址	博物馆
科学管理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发掘现场	档案馆
创新服务	科技文定、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	图书馆	旅游景区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西安元智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 Ltd.

联系人: 梁总 1357270596  
座机: 029-88346392  
官网: 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 info@microwise-system.com